

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 ——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

陳世敏**

* 本文同時刊登於《傳播與社會學刊》36期（2016年4月）。

** 陳世敏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退休教授，email: chensm@n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陳世敏（2016）。〈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新聞學研究》，127: 153-161。

梁啟超談到小說的群治功能，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論述，他說：

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于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梁啟超，1902）

將「小說」一詞易為「新聞」，可能更貼切！新聞跟小說一樣，有如空氣、日光、水無所不在，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待近人麥克魯漢主張「傳媒就是環境」一說提出，梁啟超早已洞悉傳媒之社會影響力。我們觀察梁氏許多關於報章雜誌的相關言論，可以斷言：就社會影響力這一點，梁氏如果在世，同樣會主張「新聞／傳媒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因其含有穢質毒性，日日夜夜，食息者將不免輕者憔悴萎病，重者慘死墮落。

這一脈相承的傳媒社會思想，流傳很廣，主調就是「公共利益」，認為傳媒首要的服務對象，是社會，是大眾。不僅公共傳媒系統要服務社會，商營傳媒系統也要同樣在服務社會——只是經營方式不同，可以以廣告營利而已。哲學家杜威曾經提出以傳媒取代教育系統的構想，覆按年代，大約在梁啟超前後。可以說，服務「公共利益」是傳媒的天賦職責，也是它所以構成社會重要體制的價值所在。

梁啟超與杜威不約而同看到的這一點，日後在普立茲和威廉斯手上，形成了新聞教育的哲學根源。曾經是黃色新聞大師的普立茲，晚年痛改前非，認識到傳媒必須成為社會正面力量的重要性，乃捐助鉅款，成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設立基金獎勵優秀記者。他認為記者的責任重大，必須像醫師、律師一樣，接受專業教育。

而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 1908 年（比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早了兩年）

在密蘇里大學成立，其首任院長威廉斯，給學生的第一課即是「我堅信新聞事業是一種神聖專業」。培養專業，無疑是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也是始創者所以致力於新聞教育的初心。

這個思想，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十九世紀末現代報業形成之前，美國報業經歷了政黨報業和聳動主義報業，尤其是後者，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痛定思痛，社會菁英逐漸認識了報業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重要性，要讓記者像醫生、律師一樣，以專業來服務社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大學新聞學院，模仿法學院、醫學院，是以 professional school 的姿態，而不是以 college 形式出現的原因。二十世紀初正值美國國會通過教育法案，廣設州立大學，新聞學院趕上了這一波風潮，是在專業學院實用技藝的大學教育理念下成立的。

如眾所知，近代中國大學新聞教育受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密蘇里新聞學院教師們來華講學的影響，可以推測：新聞專業的理念中國大學並不陌生。但直到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回到政大新聞系任教，才明確地揭櫫了新聞專業的教育理念。

馬星野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時，仿威廉斯「報人守則」，手擬「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闡釋新聞專業的內涵，其中第十條明白寫著：「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領導公眾之事業，參加此業者對於公眾問題，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其他條文涉及查證事實、謹慎報導、公正評論以及記者個人操守等專業倫理規範。



前述新聞專業的濫觴，始於近代報業之前的報業黑暗時代。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矯枉的設計，也可以說它是報業與時俱進的轉身蛻變。無

論如何，專業主義的理念是奠基於個人報業的，是俗稱記者為無冕之王思維之下的產物。細看專業的內涵，從要求記者擁有豐富的知識到要求記者操守高潔，在在顯示：我們現在所瞭解的新聞專業，在二十世紀伊始的美國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基本上是新聞學術兩界迫於社會壓力所做的矯枉設計，它意外給予了近代報業一個華麗轉身的機會，專業主義的義理，成為近代報業價值觀的冠冕。

當然，專業不是鐵板一塊。日後的報業發展中，專業與其所在的報業現實和社會環境之間，不斷拔河，也不斷自我修正其內涵。新聞專業義理逐漸納入了傳媒組織、傳媒產業、社會與政府等相關的型塑力量。

本文無意、也不能析辨新聞是否為一種「真正」的專業，礙於傳媒學術兩界對傳媒專業問題討不多，本文借用職業社會學概念，將專業特質分為「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倫理規範」等四項（羅文輝，2013），來追思徐佳士教授的新聞專業事蹟，包括記述他作為一個記者和作為一個教育者的相關行誼。筆者認為，貫穿記者徐佳士和教師徐佳士的，正是新聞中的專業。



關於專業自主

根據徐佳士自述，他的外勤記者工作生涯，始於在校時參與系上自辦的社區報紙《南泉新聞》（在重慶南溫泉）。政大新聞系畢業後進入南京《中央日報》當記者，跑社會新聞，1947 年擔任東北特派員。當時的社長是馬星野，採訪主任陸鏗。

徐佳士回憶他在南京《中央日報》工作的日子時說：「馬老師要把

報紙辦成『每日的百科全書』，他的新聞理論、做事方法及對新聞的執著，給我很大的啟發。」

報紙既然是每日的百科全書，為社會所需，有如空氣、日光、水，這樣的辦報願景，毫無懸念地相對要求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極高的專業條件，這是普立茲和威廉斯重視新聞專業教育的初心。

馬星野從密蘇里帶回來新聞專業的觀念。從相關的資料，包括《陸鏗回憶錄和懺悔錄》，可以覆按：當時《中央日報》編採部門享有相當高的編採自主權，社長只負責報社的經營，不管編採部門的日常編採作業，有如「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青年記者徐佳士，在《中央日報》體驗了高度自主的編採環境——也就是當今新聞界所謂的「內部新聞自由」，從來是專業新聞人所一心嚮往的工作環境。南京《中央日報》創造了中文報業歷史上的一個洞天福地，成為那時代的領導報紙，並非無因。徐佳士的親身經驗是：

「有一次我採訪國民大會，會中有一位東北代表大聲指責陳誠把東北丟了，主張「把陳誠殺頭」，我就據實寫了這條新聞，而陸（鏗）主任居然也把它登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馬老師因此事受到當局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有處罰我，也不讓我知道。陸主任也為我「挺」了下來，自己承擔了責任。事後他才告訴我：「你差點完蛋。」（見蕭容慧，2004）

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中央日報》，編輯室自主權受到的尊重，一時無兩。報社主管甘冒危險力挺旗下記者的，徐佳士並非孤例。採訪主任陸鏗多年後承認自己心中「有日報，無中央」，新聞取捨秉持優先考量公共利益的原則，在當時實是戰戰兢兢走鋼絲上。《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黨報，外界視之為國民黨喉舌、傳聲筒，譏諷它只有宣傳沒有新聞，是「有中央，無日報」。陸鏗此語，意在反駁外界對中央日報的

刻板印象。

關於專業知識

新聞專業理念從一開始就是從記者的素質破題的。無論普立茲、威廉斯、馬星野或徐佳士，無不強調專業知識對新聞工作的重要性。細究他們所謂的「專業知識」內涵，也無例外，並非指某種專門知識，而是指博雅豐富的多方面知識，也指廣泛的常識。

英文「專業」(profession)一詞，徐佳士以慣有的徐式幽默，翻譯成中文，為「博腦佛心」。1979年，徐佳士在《中國時報》版面上以一篇題為「記者權的浮現」短文，正式提出新聞人「博腦佛心」必要性的呼籲：

「新聞記者在今天自由世界盛行的制度中，地位是很微妙的。他在報社、通訊社或電台等傳播機構的外面，十分類似律師和醫生，有著「博腦佛心」(profession)的架勢。他的腦應博，心如佛，跟製造皮鞋或依公務人員服務法而辦事的人是不一樣的。他應該具備專而廣的知識和技能，懷著菩薩心腸，犧牲小我做救人濟世的工作。」(徐曉，1979年11月6日；編按：徐曉為徐佳士筆名)

次年徐佳士在《天下雜誌》的文章中，以「博腦佛心」為題，談到台灣社會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包括媒體界人士，自律不足的問題。這是將專業的內涵，從知識廣博進一步擴大到自律。這裡暫時按下不表。

1967年政大新聞系將兼任教授徐佳士改聘為專任教授，兼系主任。徐佳士於是辭去台北《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一職，專心政大教職。他就任系主任之後，在原本已經十分人文社會取向的政大新聞系課程，

添增了許多後來他稱為「博腦佛心」的改革。

一、開設第二國文課「現代文選」，要求學生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經典文獻，在課堂上做口頭報告、小組討論、文字報告；二、設立「集中選修」制度，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之外的科系中，任選一系，選修二十學分，來提高專業知識的素養；三、聘請資深媒體人歐陽醇、余夢燕，藝文傳播界林懷民、殷允芄等人來校兼課，讓學生透過課程來拓展視野和增加對傳媒實務工作的認識；四、改變實習報紙的性質，將《學生新聞》變更成《柵美報導》，使之與社區居民的生活相結合。

整體看來，這些強調基本工夫的傳統博雅教育，是徐佳士新聞教育工作的核心價值所在，與今天大學院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構想不謀而合。

說到這裡，徐佳士看起來像極了一個傳統派的老學究？當然不是。徐佳士與時俱進，開風氣之先，曾在系裡新設立了廣告學、廣播電視等先進的傳媒產業相關課程。只是，他幾乎不提這一類的課程創新，好像在他心目中，這些終究是屬於職業性、工具性的「專門」課程，不是教學重點，也非關旨在服務公共利益的「專業」。

關於專業組織和倫理規範

典型的專業，其涉及業者的公益事項的，慣由業者的自主性組織來推動執行，而非依賴外在力量（如政府、法律）的驅迫，因此，業界是否擁存在著自主性專業組織來維護專業倫理規範，一向是判斷該產業是否為專業的指標。徐佳士在專業組織和專業倫理規範這兩方面，堪稱無役不與，是學界奇葩。

- 他於 1971 年出任剛成立的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秘書長，接受該會委託，與李瞻教授、閻沁恆教授於 1974 年共同完

成了「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無線電廣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範」，是日後中文傳媒自律活動的張本。

- 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 1974 年改組為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徐佳士出任第一屆評議委員，並持續達七屆之久。
- 他想要改變傳媒體制和環境，在倡導新聞自律之外，還大聲疾呼，鼓吹制訂以保障記者權益為主旨的新記者法。
- 他支持傳媒產業成立自主性專業組織（1994），支持台灣記者協會成立「媒體觀察委員會」（1995），支持無電視民主化運動（即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2000），參與公共電視法立法，參與籌備民間公益社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並出任第一屆董事長。
- 寫了許多文章，宣揚人民知的權利，認為知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傳媒應當提供機會給民眾發聲，讓民眾得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看」徐佳士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角度，筆者重溫徐教授行誼，獨鍾他的「博腦佛心」。你看，把「專業」說成「博腦佛心」，多有東方色彩呀！從記者徐佳士到教授徐佳士，我感覺到他始終以新聞專業作為主旋律，這在講求科技至上、績效至上的當今社會，可真是空谷足音。

令人不解的是，新聞專業自解除軍事戒嚴起，開始全面潰敗。猶記得軍閥時代，有南京《中央日報》挺身作報業的中流砥柱，戒嚴時代有記者在新聞裡「埋地雷」以規避警備總部的新聞檢查。這一切恍如昨日。至於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不是癱瘓，就是已經解體。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式微，反射出專業退場的大戲還

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

在繼續上演中。舊記者法已於 1999 年廢除，連媒體主管機構新聞局也已撤銷多時，可是我們還未聽到以保障記者為主旨的新記者法（傳媒基本法），有任何下樓的聲響。置入新聞、行車記錄器新聞、YouTube 新聞構成了我們的心靈「空氣」，像塵霾，令人窒息。

不禁要問問：我們為何距離專業的初心愈來愈遠？

參考資料

- 徐曉（1979 年 11 月 16 日）。〈「記者權」的浮現〉，《中國時報》，第 30 版。
- 梁啟超（1902）。〈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下），頁 3-8。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羅文輝（2013）。〈新聞人員的專業地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傳媒關鍵概念》，頁 151-155。台北：巨流。
- 蕭容慧（2004）。《生涯規劃智慧王》。台北市：未來書城。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二七期 2016 年 4 月